

土家族问题研究丛书

彭英明·主编

民族出版社

004118

土家族文化通志新编

土家族问题研究丛书

土家族文化通志新编

彭英明 主编

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土家族文化通志新编/彭英明主编.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01.11

(土家族问题研究丛书)

ISBN 7-105-04747-X

I. 土… II. 彭… III. 土家族-民族文化-文化史 IV.
K287.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83542 号

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和平里北街 14 号 邮编 100013)

网址: <http://www.e56.com.cn>

迪鑫印刷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2001 年 11 月第 1 版 2001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3.75 字数: 345 千字

印数: 0001-2000 册 定价: 24.80 元

该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退换

(总编室电话: 64212794; 发行部电话: 64211734)

《土家族问题研究丛书》编委会

主 任	苏晓云		
副主任	张洪伦	彭英明	
委 员	苏晓云	张洪伦	彭英明
	牟廉玖	段 超	段绪光
主 编	彭英明		
副主编	段 超		
策 划	段绪光	段 超	

《土家族问题研究丛书》序言

苏晓云

生活在湘鄂渝黔边区的土家族是一个勤劳、勇敢的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土家族人民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发展、进步作出了重要贡献。如今，土家族人民正沐浴着新世纪的曙光，阔步向前迈进。

土家族有着悠久的历史 and 灿烂的文化。先秦时期，土家族先民巴人就活跃在历史舞台上。唐末五代，土家族作为一个民族共同体形成后，得到迅速发展，他们在改造自然过程中创造了光辉的民族文化。土家族“西兰卡普”深为汉族人民所喜爱，土家族吊脚楼在中华民族建筑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土家族竹枝歌是竹枝词的直接源头，为中华民族文学百花园中的一枝奇葩。摆手舞、跳丧歌、哭嫁歌……丰富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内容。

土家族人民十分热爱自己的故土，他们披荆斩棘，辛勤耕耘，用勤劳的双手开发祖国山区，使昔日榛榛荒蛮的山岭，变成绿绿葱葱的沃野，为中华民族的发展、繁荣作出了重要贡献。

土家族人民有着光荣的爱国主义传统和革命斗争精神。每当外敌入侵、民族危机之时，他们便拿起武器，保家卫国。明朝嘉靖年间，日本倭寇侵扰东南沿海，烧杀抢掠，民不聊生。在这民族危机之时，土家族将士不远千里，跋山涉水，从偏远的武陵山区奔赴东南抗倭战场。在与倭人的战斗中，土家族士兵不怕牺牲，英勇战斗，多次挫败倭敌，为抗倭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

献，史称“东南战功第一”。在中华民族近代反侵略斗争中，处处活跃着土家族儿女的身影，虎门沙角炮台留下了土家族将领陈连升搏杀英夷的身影。大沽口炮台回荡着土家族将领罗荣光杀敌的呐喊声，恩施、酉阳城内至今流传着土家族群众在反洋教斗争中可歌可泣的故事……在抗日战争中，土家族人民不甘后人，无数土家族儿女奔赴抗日前线，效命疆场，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了一曲曲抗日救国的壮丽凯歌。

在中华民族翻身求解放的革命斗争中，土家族人民也作出了重要贡献。辛亥革命时期，许多土家族仁人志士“提起寰宇烘白日，掀翻沧海洗青天”，为推翻专制、建立共和而奔走呼号、喋血成仁。大革命时期，不少共产党员在土家族地区从事革命活动，星星之火在土家族地区迅速成燎原之势。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土家族人民本着“要吃辣子莫怕辣，要当红军莫怕杀”的大无畏精神，跟着贺龙闹革命，广阔的土家族地区成为革命的热土，湘鄂西、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相继在此诞生。在解放战争中，无数土家族群众投入火热的革命斗争中，有的战场杀敌，有的支援前线，为打败反动派、建立新中国，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新中国建立后，土家族人民为建设新中国不懈奋斗，他们发扬战天斗地的精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土家族人民在党的民族政策光辉照耀下，沐浴改革开放的春风，对外开放，对内搞活，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济文化有了突破性发展，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就。

回顾过去，我们为土家族和土家族地区的建设成就而高兴。但我们也清楚地认识到，目前土家族和土家族地区经济还不够发达，前进过程中还有许多困难。民族传统文化的糟粕阻碍着土家族的发展，山区的自然条件也制约着土家族的进步，振兴土家族

的任务还很艰巨，山还高，路还长。在新世纪中，如何加速土家族地区的发展，成为土家族人民必须要解决的问题。因此，在进行经济文化建设的同时，加强对土家族问题的研究，为土家族的发展提供参考，已显得十分迫切。《土家族问题研究丛书》正是本着加强土家族研究、促进土家族发展的宗旨编撰而成的一套学术性著作。本丛书由两部分组成，一是对土家族历史和传统文化的研究，这些著作力图通过对土家族历史和传统文化的剖析，弘扬土家族文化的精华，剔除土家族文化中的糟粕，增强土家族人民的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自豪感，全面振奋民族精神，促进土家族和土家族地区的发展。二是对土家族地区现实问题的探讨，这些著作力图通过总结新中国建立以来，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土家族地区经济文化建设的经验和教训，结合国家政策和土家族地区的实际，对当前土家族及土家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重要问题进行探讨，提出解决问题的对策和办法，为土家族地区社会发展和进步提供政策参考。

时代在前进，社会在发展，要在二十一世纪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需要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奋斗。我们希望这套丛书能够对土家族和土家族地区的发展进步有所启示，为中华民族的腾飞有所贡献。

(苏晓云，土家族，现为湖北省人民政府副省长)

勘 误 表

页	行	误	正	页	行	误	正
前图4	2	皮肤病院	皮肤病防治站	220	14	A B S	H B S
17	8	马路巷, 新建五层楼	马路巷新建五层楼	241	6	道	通
106	7	168	148	303	10	设	没
165 167	倒9 倒1	(1930)	(1940)	308	9	独家 大办	独家办
191	倒5	洞庭庭	洞庭溪	315	倒4	年10	10年
208	12	蔬	疏	327	11	理管	管理
208	13	脾	痹	337	3	医博士	医学 博士
208	14	未	末	351	2	1286	1986

主要参考书目

1. 土家族简史编写组:《土家族简史》,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
2. 《中国土家族习俗》,中国文史出版社 1991 年版。
3. 田发刚、谭笑:《鄂西土家族传统文化概观》,长江文艺出版社 1998 年版。
4. 杨昌鑫:《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教育志》,湖南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版。
5. 彭继宽、姚继彭:《土家族文学史》,湖南文艺出版社 1989 年版。
6. 李绍明:《川东西水土家族》,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
7. 湖南省少数民族古籍办公室:《湖南地方志少数民族史料》,岳麓书社 1991 年版。



80010591

概 述

土家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重要成员，其悠久历史和奇特文化，渗透在民族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全面系统地叙述和介绍土家族文化，以继承民族文化优良传统，开创新的民族文化生活，是一件很有现实意义的事情。

什么是文化？目前学术界认识尚不尽一致，但一般公认，文化定义，应分广狭二义。《大英百科全书》^①就把文化区分为两类，第一类是所谓“一般性”的定义，将文化与总的人类社会遗传等同起来，认为：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人种学意义而论，是一个复杂的整体，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所获得的才能和习惯。第二大类文化，提出了一个多元的和相对的文化概念，认为：文化是一种渊源于历史的生活结构的体系，这种体系往往为集团的成员所共有，它包括这一集团的语言、传统、习惯和制度，包括有促动作用的思想、信仰和价值，以及它们在物质工具和创造物中的体现。还有一些文化定义，包括的面则更广泛，有的说文化是指全部社会遗产，包括人类生活中不是与生俱来的所有东西：生产工具、武器、机器、社会机构、信仰、思想、宗教、艺术、音乐和文学；有的说文化

是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等等。

因此，根据广义的文化定义，我们认为，可以把文化分成三个部分，即：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这三个部分，既有其相对的独立性，又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相互渗透，相互促进，构成了一个有机的文化整体。土家族文化，亦是如此。

(一)

土家族自称“毕兹卡”或“贝锦卡”。据1994年全国第四次人口普查统计，土家族共约570多万人，主要居住在湖南省湘西州的永顺、龙山、保靖、古丈、吉首、凤凰、泸溪等县市，张家界市的永定、武陵源区和慈利、桑植两县，常德市的石门县，湖北省恩施州的来凤、鹤峰、咸丰、宣恩、建始、巴东等县和恩施、利川两市，宜昌市的长阳、五峰两县，重庆市的酉阳、石柱、黔江、秀山、彭水、涪陵等县，黔东北的沿河、印江、思南、江口、德江、铜仁等县市。整个土家族地区，以武陵山和酉水、清江为中心，西抵乌江，东接松宜，北起巫山，南接澧沅，在我国中部偏西南地区。

据初步研究，土家族语言系汉藏语系藏缅语族，接近彝语支，没有形成自己的文字，现除少数地区外，已通用汉语汉文。

对于土家族的族源，目前尚无统一的意见。经学术界多年研究，大致有三种说法，一是古代巴人说，二是土著说，三是乌蛮说。我们是多源论和主源论者。我们认为，世界上的任何一个民族，都不可能是由纯粹单一的族源形成的。土家族也不例外。她是一个由古代巴人的两支——廪君蛮和板楯蛮为主源，融合了后

来的众多族群，经过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到宋元时期才最终形成的一个民族共同体，发展到今天，已经成为祖国社会主义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

据考古发掘，早在新石器时代，在湖北省长阳土家族自治县，就有早期人类“长阳人”居住。湖南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泸溪县浦市和五里州，也发现了新石器时代的遗址。湖南省张家界市，也有新石器时代的“大庸古人堤遗址”发现。所有这些发现，虽不能直接证明它们就是古代巴人之祖和今天土家族的最早先民，但可确凿无疑地证实，早在远古的新石器时代，在现在的湘鄂西土家族地区的土地上，就已有古人类活动。

关于土家族先民——古代巴人的历史传说，最早文献记载见于《山海经·海内经》，称“巴方”，殷代甲骨文亦有“巴方”之称，据考约在今汉水上游一带。晚于《山海经》的史籍《世本》、《后汉书》、《华阳国志》也有记载，这就是有关巴人廩君蛮和板楯蛮的史迹。据称：廩君之先，故出巫诞，“本有五姓：巴氏、樊氏、覃氏、相氏、郑氏，皆出于武落钟离山”，即今湖北长阳，后由东沿清江而上，活动于今鄂西一带，大多成为今鄂西土家族的古代直接先民。板楯蛮有七姓：罗、朴、督、鄂、度、夕、龚，活动于今渝东一带，曾与姬姓巴人一起，被周封为“巴子国”；后为秦人所灭，其中“五子”流入五溪，融合原五溪土著民，大多构成了今日湘西的土家族。巴人诸支，均表现出其独特的文化特征，可以说是今日土家族最早的文化渊源。

自两汉至隋唐五代，是古代巴人诸蛮的活跃期，也是今土家族初步形成和其文化特点逐步突出的时期。如果说，在三国两晋南北朝，现湘鄂渝黔边土家地区，与全国一样，尚处于诸群混流、未能稳定之局面的话；那么，进入隋唐以后，土家族先民诸蛮，即所谓的“峡中蛮”和“巴东蛮”，以及“杂侧荆、楚、巴、黔、巫中”诸蛮，由于隋唐的大统一，也已逐步形成了聚居今湘

鄂渝黔边区以武陵山区域为中心的分布格局。其民族特点日渐突出。《隋书·地理志》载：“其僻处山谷者，则语言不通，嗜好居住全异，颇与巴渝同俗。诸蛮本其所出……故服章多以斑布为饰，其相呼以蛮，则为深忌。”同时，因唐王朝在今土家地区实行羁縻州制，致使土家族中的强宗大姓，如向氏、彭氏、田氏、冉氏、覃氏、杨氏、白氏、张氏等等，纷纷涌现，得以壮大，从而发展到今天，成了上述地区土家族的主要姓氏，这也是构成今日土家族宗族制度突出的重要历史原因。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土家族文化虽受汉文化影响，但因山区闭塞，古代巴风仍盛。如史载巴人“好歌舞”，自汉代兴起的“踏蹄”之歌，就对唐文化影响甚深。《思南县志》称：“巴人事鬼，伐鼓以祭祀，叫啸以兴哀，故人好巴歌，名曰‘踏蹄’。”发展到唐代，即成为一种新的土家歌谣“竹枝歌”。唐朝诗人刘禹锡乃吸收竹枝民歌，创作出独具一格的诗词曲牌《竹枝词》。刘昫《旧唐书》载：“蛮俗好巫每 淫祠鼓舞必歌俚辞禹锡或从事于其间乃依骚人之作为新辞以教巫祝故武陵溪洞间夷歌率多禹锡之辞也”。^②经顾况正式定为《竹枝词》，至后来白居易、李涉、黄山谷、陆游等诗人的丰富创作，影响了我国至今的历代诗坛。这是土家族人民对中华文化的一个巨大贡献。

宋元明清四朝，是土家族民族共同体初步形成后的稳定发展时期，也是土家族民族文化进一步得以发展的时期。史称“宋参唐制”，在今土家族地区，继续“置羁縻州县，隶于都督府，以其首领为刺史”，其办法是：“析其部落，大者为州，小者为县，又小者为峒。……树其酋长，使自镇抚，始终蛮夷适之”。^③据统计，宋代在今土家族地区共设立羁縻州 87 个，其中荆湖北路 38 个，夔州路 49 个。这就从根本上冲破了原有的氏族部落的血缘关系，民族共同地域的地缘关系更加巩固。最有意思的是，随着人们在共同地域内共同生活的日久天长，各部人群便以“土著”

自称，从而在这一时期的历史文献中，就大量出现了“土兵”、“土丁”、“土军”的记载，可视为今日土家族族称的早期出现。

在宋代实行的羁縻制度的基础上，元明及清初又建立起了巩固的土司制度，推进土家族地区进入了封建社会。元初，对“边境蕃夷，皆立农分职，以统隶之”。^④他们在进入土家族地区各州县迫使其纳土归顺以后，便设立了专为镇抚“蛮夷”名为宣慰使司的机构。宣慰之下，“其在远服，又有招讨、安抚、宣抚等使”，又“西南夷诸溪洞各置长官司”。^⑤这些机构，大多任用当地土家头领为官，故称“土司制度”。到了明代，“踵元故事，大为恢拓，分别司郡州县，听我驱调，而法始备矣”，土司制度较元朝更为完备和巩固。其办法是：“……彼大姓相擅，世积威约，而必假我爵禄，宠之名号，乃易为统摄，故奔走惟命”，所以，当“西南夷来归者，即用原官授之。其土官衔号曰宣慰司，曰宣抚司。曰招讨司，曰安抚司，曰长官司。以劳绩之多寡，分尊卑之等差，而府州县之名亦往往有之。袭替必奉朝命，虽在万里外，皆赴阙受职”。^⑥史载，明初在今土家族地区设置的土司有：永顺宣慰司、保靖宣慰司、思南宣慰司、思州宣慰司，施南宣抚司、散毛宣抚司、忠建宣抚司、容美宣抚司、酉阳宣抚司、石柱宣抚司，东乡五路安抚司、忠路安抚司、忠孝安抚司、金洞安抚司、龙潭安抚司、大旺安抚司、忠洞安抚司、高罗安抚司、桑植安抚司，以及 45 个长官司和蛮夷长官司，再加上为“控蛮”、“御蛮”而设立的鄂西施州卫的百里荒千户所、大田千户所，湘西地区的九溪卫添平千户所、麻寮千户所、安福千户所，辰州卫的镇两千户所，永定卫的大庸千户所，黔东北地区边境设置的镇远卫和偏桥卫，川东南的黔江千户所等，大体上包括了今天湘鄂渝黔边的土家族聚居区域。清朝初年清政府基本上承袭了明代的土司建制，“今来投诚者，开具原管地方部落，准与照旧封袭”^⑦，直至“改土归流”。所以，我国在对土家族的认定工作

中，基本上以明清两代在湘鄂渝黔边所设的土司制度地区为地理范围，并根据卫所地区的实际情况确定民族成分，这是很正确的。

反映在土司时期的土家族文化上，也是比较丰富的。最大特点，除了民间群众传统文化继续保持外，主要是以儒学为中心的汉文化的进一步传入，从而形成了土家族的土官文化和文人文化，深刻地影响到土家族地区的政治、经济及文化生活。据史载，元初，鄂西建始、施州已开始设立汉学。至明代，在朱元璋的“边夷皆世袭其职，鲜知礼义，治之则激，纵之则玩，不预教之，何由能化”的思想指导下，下令：“诸土司皆立县学”，“边夷土官，皆设儒学，选其子孙弟侄之俊秀者以教之，使之知君臣、父子之义，而无悖礼争斗之争”，规定“土官应袭子弟，悉令入学，渐染风化，不入学者，不准承袭”。^⑧这一政策，一直延续到清初，大大地促进了土司时期土家族制度文化的发展。这是应当予以肯定的。

事物的发展总是有始有终的。土司制度到了清朝的初年，便进入了它的衰亡期。土司间的领地争斗，土官内的夺权、争战、仇杀，战火连绵，给社会造成极大破坏，给人民带来极大痛苦，于是有“改土归流”之议。雍正三年（1725年）云贵总督鄂尔泰上书：“欲百年无事，非改土归流不可。”^⑨这一上书，得到皇帝批准，于是土家族社会自此进入“改土归流”时期。史载，今土家族地区的“改土归流，虽早在明代即有先例，但大多数地区则是于雍正四年至十三年（1726—1735年）进行的。其方式是：废除土官统治，委派流官治理。在湘西设立永顺府，辖永顺、保靖、龙山、桑植四县；在鄂西设立施南府，辖恩施、宣恩、咸丰、来凤、利川、建始六县和鹤峰州、长乐县，渝东南设立酉阳直隶州（辖酉阳、秀山二县）和石柱直隶厅；黔东北设有思南府（辖印江、安化二县和沿河弹压委员）和铜仁府。在府县以下，原

土家基层组织“旗”改以保甲制替代，以利于加强对基层的控制。

“改土归流”以后，由于土司时期不准土民入学、“违者罪至族”禁令的废除，土家族地区的儒学教育得以建立，府设府学，县设县学，州厅也相继设学，私塾学堂也大有发展，为扶持贫困子弟入学读书，有的地方还出现了“义学”的形式。一时间，学堂遍布，书院林立，考棚兴设，开科取士，整个土家族地区，“文教颇盛”，汉文化得到飞速发展。与此同时，由于自元明以来土司“蛮不出境，汉不入洞”禁令的打破，广大汉族群众纷纷进入土家族地区，民间往来日益频繁，汉民族先进的生产技术和先进文化纷纷传入，与土家文化相互渗透，相互溶化，使土家族的传统文 化也得到了发展，从而在新的基础上产生了许多新的土家民间文化。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党和国家民族政策的正确指引下，土家族作为单一民族得到正式认定，绝大多数土家族群众的民族成分得到恢复，土家族地区建立了民族区域自治政权，人民当家作主，民族经济发展迅速，土家人民的社会主义民族文化生活也得到了发扬光大，成为当代中华民族社会主义文化不可或缺的灿烂奇葩。现在，居住在湘鄂渝黔边山区的 500 多万土家儿女，正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沿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阔步前进。

(二)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曾经写道：“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

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⑩所以，人们首要的文化活动就是物质文化活动。

土家族的物质文化，无论是其生产活动，包括农业、林业、畜牧、渔业、手工业等生产，还是其生活方式，包括饮食、衣饰、居住、运行等，都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构成了多姿多彩的土家族山地农业类型的物质文化。

在物质生产活动方面，除了其生产方式、生产工具和生产程序以外，最能体现土家特色的民族文化当推“赶仗”、“薅草锣鼓”、“采茶情歌”和“船工号子”了。所谓“赶仗”，又叫“撵肉”、“赶山”，即打猎，它是土家族先民渔猎经济生活的反映。打猎前，首先要敬猎神——梅山神，即张五郎，举行隆重的祭祀仪式，唱打猎歌，唱扫山、安堂、催山、安套、扫影、扫套等内容，以鼓舞士气，增强战斗信心。祭毕即按各种狩猎程序，分工进行。待获猎后，再返回祭祀猎神，再按“山中打猎，见者有份”的原始平均主义原则，进行分配，虽辛劳多者，也毫无怨言，乐得人人高兴，各自归家，充满欢乐气氛。“薅草锣鼓”，又称“挖土锣鼓”、“山锣鼓”，土家语叫“锣鼓哈”，为土家群众集体从事农业生产、进行互助互帮时所唱之歌。据说，此活动最初为驱赶野兽雀鸟偷食粮食，土家族《竹枝词》云：溪州之地黄狼多，三十六岗尽岩窝，春种秋熟都窃食，只怕土人鸣大锣。土家族地区多山地，人们多以种植杂粮为生。每逢开荒种地，劳动繁重，更需群力而为，薅草更须抢天气，争季节，为不误农时，人们便采取对换工具的办法，互相帮助，轮流换工。因参加劳动的人多，为指挥鼓劲，人们便把惊走野兽的锣鼓演变成为一种民间乐式——打锣鼓，一为娱乐，一为激励，让人们在锣鼓与歌曲声中